

## 人權悖論

毛漢光

吳鳳技術學院講座教授、中正大學榮譽教授

### 摘 要

人權項目在近代不斷增加，人權項目間產生矛盾現象，此即人權悖論。本人將人權項目分為五大類即：生存權、平等權、自由權、參政權，及發展權，共得十種相互關係，大部分人權項目之間是互補的，但亦有抵觸的，指出矛盾之處是去除人權障礙的理論基礎，分析如下：

一、生存權 vs. 平等權：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至知識經濟的財富累積，人間分配的不平等，已從以往原始公社共同生產分配、或農業生產成果的少量差距，演變成巨大的不平等。

二、生存權 vs. 自由權：自願結束生命的安樂死衝擊生命權。而生產線螺絲丁方式的作業，妨礙人們整體創作的智慧暨心靈之自由。

三、生存權 vs. 參政權：參政議題之專業化與生產專精化之不可兼得，以及弱勢者抵抗權在何種情況下可以施行，其界線甚難劃分。

四、生存權 vs. 發展權：近代科技大規模開發自然資源，使人類生存權大大地改善，但亦因此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權利與生存權利嚴重衝突，甚至影響

到子孫輩的生存。

五、平等權 vs. 自由權：在政治思想上，自由與平等可以統一；但在經濟領域中，自由經濟的高度發揮，實際上產生社會上極度不平等。

六、平等權 vs. 參政權：為了保障弱勢團體、少數族群的平等參政，在許多情況下有比例參政的措施，這種辦法無法按個人能力去分配參政機會，齊頭點的平等不但製造另一種不平等，同時也影響到競爭力。

七、平等權 vs. 發展權：近代科技發達是發展權神速推進的原動力，尤以經濟方面的發展最為明顯，不但在生產方面產生的能量大幅拉大差距，同時在分配時如何顧及正義原則，而又不影響到平等權，是廿世紀羅爾斯、諾齊克等哲學家激辯主題。

八、自由權 vs. 參政權：自由到何種程度而不會影響到政治安定，尤其是言論、出版自由的界線對於一個團體的影響，以第四權自居的媒體與民選的政府間矛盾日益加劇。

九、自由權 vs. 發展權：國家、社會政策對於個人自由權的限制，孰輕孰重是集體人權與個人人權的悖論。

十、參政權 vs. 發展權：國家發展之同時，需要國際社會相助，援助國對受援助國不可能毫無政治條件，往而影響到國家發展權。

人權有母體性，隨著時代進展，每一大類人權會繁衍其他的人權，有的人權會與他一類人權產生悖論，人權研究的主旨是擴大其相同點，同時要洞悉其悖論，預先化解其間差異點，使人權的進展達到水到渠成的效果。

**關鍵辭：人權、悖論、政治、社會**

## 緒 論

人類文明進展的總方向，指向人的價值提高、人的權利增加，以及人的幸福內容的豐富。

有的學者認為 2,500 年以前，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產生「哲學的突破」，所謂「哲學的突破」的主要精神乃人文關懷<sup>1</sup>，尤其是希臘文明，「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的出現，是希臘的『哲學的突破』的最高峰。整個西方文明中，理性認知的文化基礎由此奠定，哲學、科學，以及神學都跳不出它的籠罩。」<sup>2</sup> 隨著西方文明今後在世界各地推廣，人的理性認知的內容亦不斷地擴大，內容不斷地充實，人權的種子至 15-16 世紀的文藝復興再次萌芽，文藝復興主要精神是人文主義，「在有關人權方面，人文主義者不但認為人有生存之權，追求快樂、幸福之權，而且有自由、平等、參政、議政之權。人文主義先驅者但丁在《神曲》中談到，唯獨人類才有『自由的意志』。他在《論世界帝國》中，第一次從理論上提出了政治和宗教平等，政教分離的觀點，向君權神授、教義高於皇權和教會至上等觀點提出挑戰，並在當時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人權』概念，強調要建立統一的世界『帝國的基石是人權』，帝國不能做任何違反人權的事。薄伽丘則認為人生而平等。……」<sup>3</sup> 16-17 世紀的宗教改革，打破教皇教會壟斷聖經神學的解釋權，每個人皆有詮釋上帝意志，其結果是人的心靈思想解放，人文與科學思想自由蓬勃發展，18 世紀西歐工業革命，隨即擴及美洲及其他歐洲部分<sup>4</sup>，從此奠定了人權的物質基礎，18-19 世紀民主憲政改革，發軔於英國，成就在 1776 年美國獨立、1789 年法國大革命，美法以國家最高法律憲法保障人權，其後世界列國紛紛效法。19-20 世紀社會主義興起，倡導社會上基層人民、弱勢族群皆可享受人權，促進資本主義既得利益者改良其過於不平等的權力分配。20-21 世紀，聯合國以及各大地區皆出現各種維護人權之國際組織，人權已非單純國內事務，而是普世價值，共同推展的目標，所以 21 世紀是人權時代。

<sup>1</sup>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 28-29。

<sup>2</sup> 同前註，頁 28。

<sup>3</sup> 沈之興、張幼春主編，《西方文化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頁 119。有關文藝復興之著作極多，此處節錄人權部分之總體看法，以貫穿人權之源流。

<sup>4</sup> 布羅代爾著，顧良、施康強譯，《15-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1992），凡三冊。

在這幾世紀的人權發展史中，人權內容漸漸具體化，不僅僅是學者呼籲的烏托邦，也隨著物質文明之改良，政治社會制度合理化，人權項目日益增多，細分人權項目，至今至少有 147 種<sup>5</sup>，人權項目還會繼續增加，增加的原因是：其一，隨著人類追求人權日益努力，有的人權項目原本是模糊概念，漸漸有清晰的內容，於是分出很多次級細目，而這些細目在人們關懷之下，演變成單獨的項目；其二，由於科技進步，社會分工細膩，產生新的權利；其三，有的人權漸趨成熟，至少在人權發展先進國家或社會裡已成為共識，人類又展開新的追求，以達到更完美的境界，例如各種發展權等。

人權不斷地增加項目是文明進步現象，但由於人權項目的增加，發展某些人權常會影響到其他人權的進展，這種現象在 21 世紀會愈來愈多，此即所謂「人權悖論」也。當人權間發生相互矛盾現象時，其間如何取捨，或因時因地排出發展人權項目的先後次序，已是發展人權學者所應關懷，使整體人權進展早日取得共識，減少障礙而順利推進。

本人在研究人權時，為研究方便，使細節項目不致流於瑣碎，將人權分為四大類，即：生存權、平等權、自由權、參政權<sup>6</sup>，現仍以此四大類為主，加上發展權等，共五大類，觀察其間「悖論」現象，做為掃除人權發展負面因素的起步工作。此處必須說明，人權間互補現象遠超過其矛盾點，互補是其大部分，矛盾是其小部分；互補是其大原則，矛盾是其細項目中的枝節。互補現象在其他學者著作中論者多矣！本文集中矛盾之討論，庶幾乎盡量達成人權理論的完美性。

生存權、平等權、自由權、參政權、發展權等五大類間相互關係共有十多種，捨去每類人權自己之間之關係（即生存權與生存權……），共得十種關係，下列展開討論。

## 一、生存權 vs. 平等權

生存權的範圍很廣，其中最重要的是生存的物質基礎，某些部落社會可能有部落共同財產制度，至少在某些角度範圍內共同狩獵、共同農耕，最後在分

---

<sup>5</sup> 王家福、劉海年主編，《中國人權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頁 6 及其相關內容。

<sup>6</sup> 毛漢光，《中國人權史生存權篇》（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4），頁 6。

配時，共同分享，這樣的部落社會其生存權與其財產平等權並不出現緊張關係，人類不平等現象的出現，據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謂<sup>7</sup>：「自從一個人需要另一個人的幫助的時候起；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度就出現了。」<sup>8</sup>「按照賢明的洛克的格言：在沒有私有制的地方是不會有不公平的。」<sup>9</sup>「在自然狀態中，不平等幾乎是不存在的，由於人類能力的發展和人類智慧的進步，不平等才獲得它的力量並成長起來；由於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終於變得根深蒂固而成爲合法的了。」<sup>10</sup> 1884 年恩格斯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也認爲私人商品、土地所有制、貨幣累積是財富不平等的現象，而一次又一次的社會大分工，加劇不平等的貧富對立<sup>11</sup>。從狩獵進至農耕，自農耕進至工商業，自工商業進至服務業，以及智慧財產的時代，財富累積使貧富不平等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差距，「把財產視爲生活條件、權力與追尋快樂唯一的決定項，是眾多關於財產的意底牢結所共有的認知。……一方面，某些意底牢結認爲，私有財產的所有，是最爲重要的『基本自然權力』之一，並且是人類尊嚴和存在的關鍵之所。但另一方面，有些意底牢結則認爲，私有財產是一種罪惡，且是少數人壓制多數人重要的工具。」<sup>12</sup> 資本主義是財產累積的理論基礎，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秉持平等思想，在全世界與資本主義制度形成強烈對照與對抗，這兩方面在 20 世紀後半期互有妥協，「當資本主義逐漸地在形式上修正對私有財產的絕對保護時（如往社會福利立法、累進稅制，或將某些基本工業轉爲公營時），社會主義的體系則擴大了私有財產的範圍。」<sup>13</sup> 緩和了兩極間矛盾。但是，在實行時之分寸一直存在著兩者間的衝突。尤其有關生存權最基本的福利政策，如醫療衛生保健預算與設備，勢必抽取更多的私人財產，以維持中等以下家庭之生命之維護，高收入的家庭將付出巨大所得，超過一定的比例時，形成另一種不平等，這種過量抽取高所得的財產，將會影響有智力、財力、能力者不發揮其能量之極限，因而影響整體財產增加之稅量，以

<sup>7</sup>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原書於 1753 年寫成，1755 年初版，中譯本參見 1986 年，臺北唐山出版社。

<sup>8</sup> 同前註，頁 107。這是盧梭反證說法，仍強調私有制的不公平，其實不公平的地方甚多，就以財產權而論，有其真實意義。

<sup>9</sup> 同前註，盧梭書中主要精神是闡述不平等起源於私有制，該段是簡錄其部分論述。

<sup>10</sup> 同前註，這段論點是盧梭書中的結論部分。

<sup>11</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臺北：谷風出版社，1989 年譯本），頁 180-187。

<sup>12</sup> 李亦園等編，《觀念史大辭典》（臺北：幼獅出版社，1992），「政治與法律卷、財產項」，頁 473。

<sup>13</sup> 同前註，頁 475。

及文明推進的速度，這種現象在某些高度福利政策國家已經發生。

以平等權而論，契約關係是平等權的基礎，理論上契約關係表示雙方或多方在平等基礎上簽訂，實際上是否如此呢？以農耕時代而言，由於生產來源出於土地，而可耕地有其限制，一個農民與地主簽訂耕佃契約，表面上是出於雙方同意，且有中間見證人，但在經濟條件的大架構之中，爲了生存而簽下不平等的租佃契約，實際上是不平等現象。而現代工商業、服務時代，情況更爲嚴重，大資本家掌握大工廠、大公司，由於世界運輸發達，更成立跨國公司工廠，勞工更居於絕對劣勢，這種勞資關係實際上不平等<sup>14</sup>，生存權與平等權的矛盾加劇。實際上，中小企業與大資本家的關係亦居於不平等競爭，在管理方面，以及經濟效益方面，大企業的成本低於中小企業，使中小企業日益困難，若無外力介入，企業界併吞現象必朝大企業方向發展才能生存。

## 二、生存權 vs. 自由權

自由權與平等權是西洋近代人權發展過程中最先提出的主張，而且也是最響亮的口號。但是，如果當自由權與生存權之間作一抉擇時，孰先孰後則難以定論<sup>15</sup>。且以病患要求安樂死之例分析之：生命當然是生存權最重要指標，人是否有權自由地決定自己的生死呢？安樂死有二種情況，其一是自己有意識地決定生命，其二是自己已失去意識，其他人不忍見其痛苦而希望安樂死。本文僅討論第一種情況。首先，有的宗教認爲生命爲神所賦予，自己無權決定生命。如果純以法理而言，沒有人能夠決定他人生死，包括自己在內，這是生死權的意義，自己決定自己生死的自由權當受到節制。但是，傾向於個人自由權者，把個人尊嚴放在首位，「大哲學家康德則認爲，自殺是可恥的，因爲自殺者沒有履行自身的義務，並放棄了自尊。但是在安樂死問題上，康德卻認爲，『生命不因其自身而有價值，而是與自由和自主相關聯，一個有尊嚴的生命在具備了存在的物質基礎後，才有了存在的理由』」<sup>16</sup>，「安樂死給人權固有內容

<sup>14</sup> 參見韓德培主編，《人權的理論與實踐》（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生存權」，頁 392-397。

<sup>15</sup> 常健，《人權的理想、悖論、現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五章死亡權力的悖論」，頁 167-179。提出許多看法，可參考，此處不贅述。

<sup>16</sup> 〈安樂死：從古希臘到「夏佛事件」〉，刊於《參考消息》，2005.04.06，引墨西哥《千年報》4月3日文章題〈安樂死的歷史演變〉（作者克勞迪姬·塞爾塞勒），該文有系統介紹安樂死的歷史，及其爭執點。

提出了新的問題。每個人都具有生命權，已成為人類共識。但對於人能否選擇死亡方式，安詳、快樂、尊嚴、體面地結束生命，回答則大不相同，主張安樂死的觀點認為，選擇死亡的方式是一種權力，是一種力圖注重生命價值、至死保持人的尊嚴的權力。但是，由於安樂死是對基本人權——生命權的直接挑戰，其本身有涉及一系列複雜的社會、倫理和科學技術問題，目前各國法律對安樂死大多採取極為謹慎的態度。自 1976 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通過《健康安全法》後，已有 15 個州通過了安樂死的權力法案。日本採用司法解釋方式給安樂死以有條件認可。……中國多數專家學者認為，應當以辯證唯物主義觀念來認識安樂死。人固有一死，這是自然規律，讓無法忍受痛苦的病人提前結束生命，符合人道主義精神和當代倫理道德。安樂死如同火葬和計畫生育一樣，可以逐步被社會接受……」<sup>17</sup>

最近美國佛羅里達州植物人泰莉·契亞弗引起的生命權利爭議，轟動了州地方法院、聯邦最高法院、聯邦國會參眾兩院、布希總統，以及美國民眾高度關注：「泰莉案所以會引起重大爭議，其實並不只是因泰莉的生命權受到重視而已。如果只是這樣，那只要繼續以餵食管維繫其生存即可，爭議的來源，其實是因為泰莉對於自己生命的自主意願受到重視並希望加以尊重的緣故。就是因為她曾經表達過不希望以人工方式維生的想法，才會使其丈夫認為尊重她的生命自主決定應該高於他人維持其生命的決定，從而堅持以拔管方式完成其心願的努力。在其丈夫的心中，拔管是泰莉的決定，維持泰莉存活則是他人的希望，生命是泰莉的，自然以泰莉的決定算數。對於個人自我決定生命的態度尊重到達超越生命本身的程度，其實是民主社會中，基本人權是存在於個人自主選擇之中的重要哲學觀點。社會為了這種深層的人權意識從事辯論，本身即是一種嚴肅而高尚的文化現象。辯論的雙方，都正在展現對於生命的意義從事令人尊敬的思索。」<sup>18</sup>

本文著者認為科學醫學不斷進步，減輕病人痛苦、延長病人生命隨時會研究出新的醫藥與技術，提前安樂死將失去此種生存機會。又主張安樂死者的理論都屬於技術層面，並未注意到生命本質層次。當這種情形發生，本文著者認為生命權應該優於自己決定安樂死的技術。

<sup>17</sup> 《中國人權百科全書》，「安樂死」，頁 14。

<sup>18</sup> 〈生命全與生命自主意識孰重？——談一樁驚動美國的判決〉，刊於《中國時報》，2005.03.22.社論。

在生存權之中的工作權部分，由於最新的生產管理，爲了要增加生產，工業革命以來有生產線出現，生產線將生產過程分爲若干段的過程，每一個工作操作者只要負責其中一小部分管理或動作，這種辦法可增強工作進度與品質，降低生產成本。這有別於工業革命以前的工匠師傅，工業革命以前的師傅們要完成一件工藝產品，從原料到成品都經一人之手，工作效率雖然較低，但是他們經過全部過程，對生產品有全部認識，也對生產品有成就感，有的師傅們將此產品認爲生命的一部份，也是自己發揮自己心智及改進產品的自由成就。這種心靈上、思維上的自由由於新的生產線而消失，生產線的工人們常次以往，在人們自由心智方面造成隔漠。這是現代人在大工廠、大官體體系中爲了生活而失去人類最崇高的心智、思維的自由；人們爲了生存而成爲大機器的小螺絲釘。

### 三、生存權 vs. 參政權

參政權包括：選舉權、被選舉權、平等選舉、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批評權、控告權、檢舉權、建議權、抵抗權、監督權、請願權等。在歷史上參政權與民主制度同步成長，而民主制度是人權的孿生體，人權依賴民主制度而得以實踐，民主制度是過程、是手段，人權則是最終目的。其中選舉權是一般人民最主要的參政權，在民主制度之中，有直接表達民意的公民投票，及代議政治兩大類。許多國家都以代議政治爲民主制度的主要手段，由於現代社會分工極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項目甚多，代議政治初期以農業社會及初起步的工商業的中產階級爲主要對象，大體上能代表這一階層人的利益，又初期代議政治以控制政府預算爲其主要功能，是消極的監督政府濫權，時至今日，代議政治要代表全民各階層各類人的利益，政府行政也由消極監督發展至積極行政，所謂大有爲政府也，代議政治代表們專業分工愈來愈細，選出來的代表們在授票時針對某一議題選某些人，選舉者與被選舉者的意見比較接近，也就是有代表性，在其他議題上，代表們意見與其選民不一定一致，甚至落差甚大。而一般人民生計問題，也愈來愈專業，無法明瞭國家大政的重要項目，產生了生存問題與參政權的矛盾。

而直接公投雖以單一議題爲目標，亦由於單一議題所涉及的層面絕非單一



因素，往往一個重要議題將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皆牽涉在內，一般人民在職場上貫注於生存的競爭力，根本無法研判此一議題的後果，產生生存權與參政權的悖論，即貫注於生存專業知識，將忽略其他議題知識；熱衷於各項政治議題，將減損其專業生有的競爭力。這種本質上的矛盾，由於近代專業分工加深而日益加深，同樣原因，也影響到一般人民的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批評權、控告權、檢舉權、建議權、抵抗權、監督權、請願權的實際品質。如果將參政權之中最激烈的「抵抗權」有限度地承認，學者認為「抵抗權的要件有兩個重要原則，第一是慎重原則，第二是比例原則。首先，一定要有理性的慎重與自制，也就是說，在試過所有合理手段後，基於慎重的考慮，進行抵抗。第二，抵抗手段的強硬，也必需要和統治者的壓迫、鎮壓、或者是不法，有一個比例性的考量。」<sup>19</sup>

抵抗權運用不當，就會與實定法的法律實證主義衝突，因而被司法機構判有重罪，但是抵抗權雖然在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被認定，迄今仍未被許多國家立法承認，但是這是人權議題上極為嚴肅的原則，如果沒有抵抗權則暴政如何可推翻，「理論上，如果能夠承認抵抗權發動的合憲法性，那麼，使得被統治的人以及統治者都能夠廣泛地自覺到抵抗權的意識，自然對暴政或惡法會有一種無形的拘束力，而這種拘束力基本上就是支撐立憲民主秩序的心理基礎。而且在現實上即使無法免於被處罰，但是至少抵抗者不會被批評只有道德上的考量，而能夠援用憲法或者是正義等等的法律理念，來正當化自己的行動。而統治者也無法單純地去責難抵抗者他們的違法性，並且利用法與秩序之名來處罰他們，因為這時候他們將不再有說服力。讓統治者知道，人民隨時有可能發動戰鬥性的抵抗以保護他們的權利，這是一件好事情。因此，對於暴虐壓迫的反抗，對於人民而言，是所有的義務之中最神聖的事情。但是，即便是具有倫理性的抵抗權，也不該幻想必然能以此為理由，免除其刑責。換句話說，當你在行使抵抗權時，就現實而言根本就不該期待實定法上的保護。楊儒門已經做出選擇，接下來，就要看政府和國民如何選擇了！」<sup>20</sup>

由於現代民主政體的改權，政府由人民定期選舉組成，法律由人民代表組成的立法機構擬定通過。因此，即令政府行政越權，法律不適合於時宜，祇能

<sup>19</sup> 吳豪人，〈楊儒門就是要抵抗權〉，刊於《中國時報》，2005.10.25。

<sup>20</sup> 同前註。

在任期內爲之，人民可以在任期滿以後加以更換或改變，人民在此有限的期內採取激烈的抵抗權，其所付出的社會成本過高，有一段文詞做出下列的分析，「當代抵抗主義理論認爲，抵抗權有下列兩種形式：1. 被動的抵抗或稱爲消極的抵抗，當政府濫用國家權利時，公民享有拒絕服從的權利與義務；2. 主動的抵抗，包括行使實力的抵抗和不行使實力的抵抗。不行使實力的抵抗主要是喚起輿論與訴諸法律訴訟程序及集合罷工等，行使實力的抵抗是在國家權利濫用而基本人權面臨重大威脅，且沒有其他防衛手段時的防衛性而非攻擊性的抵抗。這是由部分公民組織起來的防衛，而不是個人的防衛，其目的在於迫使政府在憲法秩序範圍內活動。在當代抵抗權行使的理論和實踐中，非暴力傾向是重要特徵。在理性與和平的精神感召中，以非暴力反抗和良心拒絕的方式，緩和矛盾、解決爭端，避免對立和衝突是行使抵抗權的原則。」<sup>21</sup>

#### 四、生存權 vs. 發展權

歐美人權發展史中，近幾百年來，都以生存權、平等權、自由權與參政權爲主，至 20 世紀中葉，大體上世界上大部分先進國家已達到一定水準，如果細細觀察，以上四大類人權屬於反抗神權、君權壓迫，爲一般人民爭取的基本人權，雖然不能完全劃分爲消極人權，但其目標是追尋自然法中所謂天賦人權；待聯合國成立，許多殖民地紛紛獨立自由，形成上似乎達到自由平等，國內參政、及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理想，實際上，許多這一類國家皆陷於貧窮，在國內與國際上是否有自由平等地位，以及決定自己命運，似乎改善不多，尤其與先進國家比較，其國民所得僅 1/10。這些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佔全球多數人口，如何爭取到上述四大類人權，要將其經濟、社會、文化基本面擴大加深，這不是消極打倒神權、君權、甚至財權可以達成，要把基本條件加強，勢必要倡導發展權，發展權是積極人權，即使已開發國家，由於國際間競爭加劇，發展權也深受重視，「人權國際協會」副主席、聯大人權委員會委員凱巴·姆巴耶，1970 年他在斯特拉斯堡人權國際協會開幕式上，發表了一篇題爲〈作爲一項人權的發展權〉的演講，指出發展權是一項人權，因爲人類沒有發展就不能生存，所有基本權力和自由必然與生存權、不斷提高生活水平權相聯繫，

---

<sup>21</sup> 《中國人權百科全書》，頁 97。

也就是與發展權相聯繫。至此，發展權概念正式誕生了<sup>22</sup>。這段文詞的意義是：其一，發展權已是一項獨立人權，且與生存權相聯繫；其二，發展權是20世紀中葉以後，尤其是21世紀與前四大類人權相結合成為第五大類人權。

「發展權與其他人權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首先，發展權不能離開其他人權而存在，只有在其他人權尤其是在起碼的生存的權利獲得了保障的前提下才能變為現實，離開了生存權，喪失了生命力而論發展權，只不過是一種奢談……。」<sup>23</sup>

實際上，發展權內容包括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文化發展等，就以權利而論，發展權又與生存權、平等權、自由權、參政權等有密切關係，也是以上權利與範疇的未來追尋的過程與目標；從正面而論，發展權與其他權利是相輔相成，也是本身權利的下一步驟，從另一方面而論，發展權與其他權利之間也有矛盾現象。本文且以現代較為人們重視的環保問題解釋生存權與發展權之悖論，「現代世界上仍然有將近 2/3 的飢餓人口，他們的基本生活尚無保證。對他們來說，環境保護權利是一種奢侈的權利。他們當務之急是如何獲得足夠的飲食、蔽體的衣衫和棲身的房屋。限制捕魚對他們意味著失去充飢的食物，限制砍伐對他們意味著喪失棲身的住宅，限制原料和能源的消耗會使他們無法換回生活的必須用品，控制污染則會扼制民族工業的發展。這種狀況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相當普遍存在著。在這些國家中，環境保護權利的實現與人們生存權利的保障存在著嚴重的衝突。」

其次，即使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中，環境保護權利的實現也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森林的保護使木材工業的發展受到限制；防止污染的各種法規，使工業企業不得不購置昂貴的濾清裝置，經濟效益差的小企業會因承擔不起這些費用而倒閉，從而導致工人失業……環境保護對現實經濟發展的這雙重影響，使我們面臨環境權利與生存權利、經濟權利和發展權利的悖論。」<sup>24</sup> 這種例子隨著工業化加速加深而日益嚴重。其他發展權之推動，對現行政治體制、社會價值、文化變遷都有衝擊，如果衝擊過大則產生失調，因而產生矛盾。又由於科技發達，人們對未能再生的能源過度使用，以加速國家社會之發展，而影

<sup>22</sup> 《人權的理論與實踐》，「發展權」，頁 403。

<sup>23</sup> 同前註，頁 415。

<sup>24</sup> 《人權的理想、悖論、現實》，頁 292。

響到未來下一代的生存條件，已經在當代社會中浮顯出來。

最近有人倡導「自然平權」，其中對於發展權與生存權之間的矛盾提出建議，即「承認任何生物對地球資源的使用及保育權。人類必須在國土規劃中制訂特定比例的下限，保留給後代生命，圓滿『後代生命資源使用的選擇權』，不僅在國內制訂於法規，更須推展國際結盟與執行。」<sup>25</sup>

## 五、平等權 vs. 自由權

在西歐美人權發展史上，自由與平等兩個名詞一直被連用，美國獨立精神倡導自由、平等、追求幸福；法國大革命的精神是自由、平等、博愛，這是因為自文藝復興以後，人們向教皇教會，以及帝王封建階級爭取思想自由、社會各平等所致，待工業革命進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制度長足發展，經濟領域產生巨大的不平等，而資本主義的主要條件是經濟充分自由，所有經濟問題皆由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縱，這是古典經濟學的自由觀，當此時也，信仰、思想、言論等自由已經漸漸近乎達成目標，而社會上卻用資本主義盡情發揮而造成貧富極端不平，因而也影響以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地位、教育機會，甚至於再投資的經濟發展，自由與平等之間產生矛盾。

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 1850-1952)是當時實用主義的主要代表，說：「民主可悲的崩潰就由於這一事實：把自由和在經濟領域內，在資本主義財政制度之下最高程度的無限制的個人主義活動等同起來；這一點注定了不僅使得平等不能實現，而且也使得一切人們的自由不能實現。」<sup>26</sup> 他認為：「誇大少數人的經濟自由而犧牲多數人的全面自由的結果。」<sup>27</sup> 這種思維已有社會主義的影子了，已無古典自由主義的範本，將某些人的自由加以限制，使得多數人獲得自由，是由於少數資本主義或掌權者的自由與社會上不平等產生悖論的結果，而限制少數資本主義或掌權者在某角度而言是限制菁英份子發揮其才智的自由，畢竟推動整體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原動力之一是菁英份子才智的發揮。

另一位 20 世紀末葉的美國學者尼斯比(Robert Nisbet)認為：「在保守主義

<sup>25</sup> 陳玉峰，〈自然平權宣言〉，刊於《中國時報》名家專訪，2004.09.29。

<sup>26</sup> 黃森、沈宗靈主編，《西方人權學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頁 494。

<sup>27</sup> 同前註，頁 495。

哲學中，最基本的原理是自由和平等之間內在的絕對的不相容原理。這種不相容來自兩種價值的矛盾目標：自由的永恆目標是保護個人和家庭的財產，而平等的固有目標則是某種再分配，或者把社群中不平等分享的物質和非物質價值拉平。況且，個人的精神和身體力量生來就是不同的，試圖通過法律和政府對這種力量差異進行補償，那只能會削弱有關人的自由，特別是最強者和最有才能者的自由。」<sup>28</sup>「在政治思想等領域，平等與自由可以統一，可以看成一回事；而經濟、利益分配的領域，平等與自由就不可能不出現矛盾，發生衝突，就會出現一個誰更優先的問題。羅爾斯通過特別關照處境最差的群體而表現出對平等的強調，諾齊克(Nozick)則毫不含糊地把自由優先，權利至上的原則繼續貫徹于社會和經濟利益分配的領域。」<sup>29</sup>

上述保守主義哲學繼續古典經濟思想，現今加入社群自由超越個人自由，以解決自由與平等的悖論，已是集體自由超越個人自由的思維，藉此以補償自由權與平等權之悖論，實際上已非當初自由的定義了。

## 六、平等權 vs. 參政權

對於因個人才智、能力有差異的工作，依照一定標準而篩選人才，這種情形是平等的機會，可以接受的選擇參與的結果，例如學術思想、科技創新能力、經濟發展的判斷等，參與機會可以平等，甄選結果可能並非每一個人都能參與，或者參與的等級有高低之差別。但是，對於一些個人才智、能力差異較小的工作，不但要求機會平等，還希望甄選結果亦趨於平等；再者還有一些工作較不易分出才智、能力高低，也同樣希望甄選結果不應過於懸殊，這一類工作大都屬於社會服務性質，尤其是政治參與工作等，這些社會、政治範疇的服務工作，祇要達到某一教育程度，或通過一定的檢定標準，就應有公平的參與機會，所以平等權與參政權的悖論，大抵出現在這種社會、政治上的一般性服務工作，而不會出現在學術思想、科技創新能力，以及經濟發展判斷等工作領域之內，這些領域如果也以平等參與的方法行之，則學術、科技、經濟等方面將

<sup>28</sup> 徐大同主編，《現代西方政治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 221，引 Robert Nisbet, “Conservat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36。

<sup>29</sup> 伊曼努爾·華勒斯坦著、郝名瑋譯，《自由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Liberalis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 180。

失去競爭力，平等權將陷入機械平等<sup>30</sup>，也很像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平頭點的平等。然而，社會、政治領域中的服務事業或參與機會，其教育程度，及檢定標準為何，是重要關鍵，如果教育程度、檢定標準的訂得過高，祇有某一小部分菁英份子才能通過，也失去平等權的精神；如果其標準訂得太低，則其工作的效率與功能將受影響，這就產生平等權與參政權的悖論。再者，有的國家或社會爲了種族、性別、地區、宗教等的平等，在參政機會中定下一定比例，如果按此比例實施，可能發生高分者或有能力者因其種族、性別、地區、宗教等某一因素，而失去參政機會，這種現象在許多人權先進國家已經出現，其悖論尙無法解決。

## 七、平等權 vs. 發展權

平等權與自由權在人權發展是上同步進行。但是，自由權在最近 300 年來得到較充分地發展，而平等權卻不及自由權那樣順利，這由於平等概念本身就非常複雜，從純理論觀察，人與人之間在政治權利、社會地位、經濟機會、教育文化獲得都應該平等達成，而實際上人與人之間由於先天才智、後天環境都不完全一樣，很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達到平等。因此在可行性與可欲性兩者之間皆有主張，同時也有協調。所謂「前者（可行性）是指我們可或不可以採取的行動，後者（可欲性）則是考慮應該如何做較有利。」<sup>31</sup> 可欲性似乎是指理論上應該如何如何，而可行性似乎指現實社會中能做到何種程度、應如何去做。所以當聯合國 1966 年自由世界提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同時，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第三世界國家亦提出《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是因爲自由世界大多數國家人權經 300 年發展，在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已有基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雖尚可加強，主要是在世界尙未達到現今已開發國家人權水準中推行；而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國家則認爲加強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之同時，更應有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的基礎，這兩個公約已經獲得大部分國家簽署。因爲人與人之間存在著許多不同，這種不同有的是強弱高下問題，有的是強項弱項各領風騷問題，學者重複將古典正義

<sup>30</sup> 余英時，〈平等概念的檢討〉，刊於《自由中國》，第 10 卷第 5 期，頁 156-159。

<sup>31</sup> 林火旺，〈羅爾斯「正義論」〉（臺北：臺灣書店，1998），頁 2。

概念做為標尺衡量平等權，也就是樣樣平等有的合於正義，有的並不合於正義，於是乎平等權與正義的關係成為辯論的核心。

1971 年 John Rawls 《正義論》乃集大成，其主要原則有二；及：（一）最平等自由的原則；（二）a. 機會的（公平）平等的原則，b. 差別原則。其次序如上所述，即第一原則優先於第二原則，a 項優先於 b 項<sup>32</sup>，林火旺認為羅爾斯「同時處理可欲性的基礎與考慮可行性。」<sup>33</sup> 著者認為羅爾斯在可行性與可欲性之間，略微傾向於可行性<sup>34</sup>，這是因為自資本主義所謂自由平等競爭 (Laissez faire) 以來，社會上至少在經濟方面造成不平等，社會、文化領域亦由於經濟基礎不平等而深受影響，甚至於還影響到政治層面，所以自 1848 年前後社會主義興起，在理論上似乎將地球撕裂為二的思潮，以資本主義為主體的自由世界與以社會主義及第三世界為主的國家展開各方面的競爭與鬥爭，羅爾斯當然是西方核心思想份子之一，但是他在此環境中也吸收社會主義平等思想與作法。另一位學者諾齊克「承認不平等是一種不幸，但他認為：第一，不平等是不可解決的，任何平等的分配最終都將導致不平等；第二，不平等並不意味著不公平，而平等也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公平的；第三，人們希望糾正不平等，但對不平等糾正不得到合理的證明。」<sup>35</sup> 諾齊克似乎更傾向於自由權的立場，因此，平等論本身存在著不同看法，這種看法達到悖論的程度。

1970 年至今已有 30 幾年，由於科技發達加速，進入到知識經濟的競爭時代，發展權在 21 世紀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都是各國的重點，羅爾斯與諾齊克在正義論方面的辯論，也引起平等權在發展權時代所產生的悖論，這一波的不平等不是由於資本主義時代制度所引起，而是人們智慧對社會貢獻大小所引起，這種悖論是當今嚴肅的課題。

<sup>32</sup> 約翰·羅爾斯，《正義論》(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臺北：結構群文化，1990)，頁 120。

<sup>33</sup> 林火旺，《羅爾斯「正義論」》，頁 4。

<sup>34</sup> 本文著者認為「正是現階段結合『可欲性』與『可行性』的辦法」，但是時至二十一世紀發展權時代則另有考慮，理由如下文。參見拙文〈平等權與孫中山思想〉，收於蔡守浦主編，《中山思想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專刊》(嘉義：吳鳳技術學院，2004)，頁 20。

<sup>35</sup> 齊德蘭·庫卡塔斯、菲利普·佩迪特著，姚建宗、高申春譯，《羅爾斯(John Rawls)》(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總序，頁 6。

## 八、自由權 vs. 參政權

自由權之中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是繼思想自由最被重視的權利，這兩種權利最會與參政權中的批評權、控告權、檢舉權、建議權、抵抗權、監督權、請願權等相衝突，其理由是原初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的對象是封建社會、專制政府，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是喚起人心，瓦解封建社會、專制政府的利器，學者對這兩種利器都從寬解釋，從寬到不參與行動即屬可許可範圍，及民主政體建立；政府由人民選舉產生，社會也由封建社會步入開放社會，原本民主政府的設計無論是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或某種混合制，政府的權利都以權利均衡與限制為制度的主要精神，如果從寬解釋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將陷政治、社會於混亂情況，如此不足以保障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在此情況之下，個人與個人之間之言論出版自由可由法律規定之，從寬從嚴視其國情而定。

一般而論，1919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明顯而即刻危險原則」是言論自由的限制。但是，個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由於民主政府是由人民選出組成，應該代表大多數（絕對多數、或相對多數）民意，個人的言論、出版自由的限制，重新被注意。美國司法又有「惡劣傾向原則」<sup>36</sup>，這一原則比「明顯而即刻危險原則」更不易有標準可循，而且「惡劣傾向原則」若運用在個人言論、出版自由與政府間關係時，政府更可運用此一原則訂出法律、政令等限制言論、出版自由。個人言論、出版自由如果僅由個人講學、個人發行論文傳單，其功效與影響有限，現今是資訊革命時代，一切資訊傳播的工具極為先進，政府祇要立法、政令規範傳播公司、電臺、電視臺、雜誌、刊物等，即可達到控制言論、出版自由，這種言論、出版自由與民選政府間的矛盾日益加劇，與多國家政府不待某些言論發生效益、某些出版喚起人們行動以前，即可先行制止，這就是現今臺灣立法院在國家傳播通訊法引起極大對立的悖論現象。

## 九、自由權 vs. 發展權

自由權之中自由選擇職業權利，見於《世界人權宣言》及《經濟、社會、

---

<sup>36</sup> 《人權的理論與實踐》，頁 546。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主要在三方面，1. 禁止強制勞動；2. 保障自由選擇機會；3. 提供職業培訓和職業指導<sup>37</sup>。另一方面，發展權也是重要的人權，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文化條件極差，雖有政治上獨立之名，而在其他方面屬於未發展國家，自 20 世紀中葉以後，至 21 世紀，人們發覺「只有當個人做為發展進程的主體時，才能做到每個人充分、自由和有意義地參與、促進和公平享有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及由此帶來的利益。然而個人和集體相互密切依賴，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國家或民族的發展，就很難談到個人的發展，所以發展必然還意味著群體和整個國家或民族的全面發展，因而也是一項不可否認的集體人權」<sup>38</sup>，對一個集體人權為大單位——國家或社會，對外為了集體利益與力量，對內為了平衡其權力範圍內的各種次團體的權利平衡，常產生兩種現象「一種基本上是保護主義的立場，一種是自由貿易的立場。這兩種相互矛盾的立場構成 19 世紀世界體系中各國決策的最主要問題。」<sup>39</sup>

個人自由權與國家發展權之間悖論，有的國家傾向於自由貿易，有的國家傾向於國家主體性，有的國家協調兩者之間的矛盾，但無論如何這中間存在的差異，隨著國際間競爭力之加劇，將愈來愈會擴大。「發展權做為一項基本人權，具有如下主要特點：1. 發展權既是一項個人人權，同時也是一項國家或民族的集體人權。……2. 個人的發展權，其訴求主要指向國家，集體的發展權則主要針對整個國際社會。在一國範圍，實現個人的發展權主要有賴于國家，...國家不僅要尊重和保證每個人的自由參與發展進程、發展決策和民主管理，還要逐步創造條件達到『在公平分配的基礎上，不斷改善全體人民和所有個人的福利』。」<sup>40</sup> 國家在政策上如何管理個人或公司的自由發展呢？在當今大型跨國公司出現時代裡，這些大型公司集資時不僅在股票市場上獲得基本資金，在其運作時還仰賴國家銀行予以資助，在國際間才有競爭力，國家透過政策管制、及金融匯率調整等方法，限制了各個人或公司的自由發展，已是常見的例子。而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是由許多有競爭力的個人與公司共同創造出來，限制其發展，則會減損國家集體的競爭力，往而使全體國民利益受損，往而又

<sup>37</sup> 《中國人權百科全書》，頁 773-774。

<sup>38</sup> 同前註，頁 113。

<sup>39</sup> 《自由主義的終結》，頁 111。

<sup>40</sup> 《中國人權百科全書》，頁 113-114。

減損許多個人與公司自由發展之意願。

## 十、參政權 vs. 發展權

參政權與發展權之關係含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以國家為單位的政治參與及國家發展權，在討論以國家為單位的會議中，有幾十個自新興殖民地獨立的國家，認為主權雖然獨立，以國家為單位的「經濟發展實際上已被不公平的國際貿易制度、不公平和不民主的國際金融和經濟機構否定了。……發展中國家的代表還一致認為，國際合作是實現發展權的必不可少的重大行動，並特別強調了合作的平等性，堅決反對發達國家在進行發展時附加任何政治條件。」

<sup>41</sup> 各國為了自身利益，在幫助他國發展時，不可能不附加政治條件，才能向國內納稅人交代，所以已發展國家向未發展、或尚待發展國家提供援助時，必定審查這類發展計畫，其政治條件自必影響未發展國家的政治主權，例如已發展國家提出糧食援助以救濟飢餓人民的國家時，自不能認為無限制的人口膨脹政策是合理的，這一類的援助當屬社會性的政策，如果附帶設立軍事基地等條件，結盟關係之建立，則更影響受援國在國際舞臺上的政治參與之限制。另外，就第二層次而言，以個人政治參與及發展權而論，若干政府之職位有一定限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長足進展，需要許多職位與人才的參與，然而，先有人才規劃、實踐而後才有各方面的發展；還是先有發展才有職位，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弔詭邏輯，隨著科技發達、社會進步，這中間的矛盾日愈加重，而悖論的項目也日益增加。

## 結 論

生存權、平等權、自由權、參政權與發展權這五大類絕大部分都是相輔相成、互相增長的，但是人權有母體性，隨著時代進展，每一大類人權會繁衍其他的人權<sup>42</sup>，復由於在執行時，其技術日益純熟，有的人權會與他一類人權產生悖論，人權研究的主旨是擴大其相同點、增加人權間力道的強度，在相矛

<sup>41</sup> 《人權的理論與實踐》，頁 407。

<sup>42</sup> 徐顯明，〈人權理論研究中的幾個普遍性問題〉，《文史哲》，1996，頁 5，舉出若干例子，此處不贅述。

盾之處則要化解其矛盾關係，使導入相互輔助之關係，人權研究者對於已發生的悖論固需要亟謀對策，對於將會發生的悖論，則在科技發展、社會進步過程中，預先洞悉其間可能之悖論，使人權的發展往歷史演進至現今，再從現今推展至未來，產生水到渠成的作用，減少經歷痛苦而後才獲得人權程度，這是研究人權悖論的目的。

### 參考文獻(依姓氏比劃排序)

- 王家福、劉海年主編 《中國人權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 中國時報 〈生命全與生命自主意識孰重？——談一樁驚動美國的判決〉，2005.03.22.社論
- 毛漢光 《中國人權史生存權篇》(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4)
- 〈平等權與孫中山思想〉；收於蔡守浦主編，《中山思想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專刊》(嘉義：吳鳳技術學院，2004)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臺北：谷風出版社，1989)
- 布羅代爾著，顧良、施康強譯 《15-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1992，凡三冊)
- 伊曼努爾·華勒斯坦著、郝名瑋譯 《自由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Liberalis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 沈之興、張幼春主編 《西方文化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
- 李亦園等編 《觀念史大辭典》(臺北：幼獅出版社，1992)
- 余英時 《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平等概念的檢討〉，刊於《自由中國》，第 10 卷第 5 期
- 吳豪人 〈楊儒門就是要抵抗權〉，刊於《中國時報》，2005.10.25。
- 林火旺 《羅爾斯「正義論」》(臺北：臺灣書店，1998)
- 徐大同主編 《現代西方政治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徐顯明 〈人權理論研究中的幾個普遍性問題〉，《文史哲》，1996.
- 常 健 《人權的理想、悖論、現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 陳玉峰 〈自然平權宣言〉，刊於《中國時報》名家專訪，2004.09.29。
- 黃森、沈宗靈主編 《西方人權學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 齊德蘭·庫卡塔斯、菲利普·佩迪特著，姚建宗、高申春譯 《羅爾斯(John Rawls)》(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
- 盧 梭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臺北：唐山出版社，1986)
- 韓德培主編 《人權的理論與實踐》(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
- 羅爾斯 《正義論》(*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臺北：結構群文化，1990)
- 〈安樂死：從古希臘到「夏佛事件」〉，刊於《參考消息》，2005.04.06.

# **The Paradox of Human Rights**

**Mao, Han-kuang**

Professorial Chair, Wu-f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onorary Professor,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categories of Human Rights have accumulated continuously; and with this accumulation, there arises paradoxical phenomena, namely the Human Rights Paradox. I sort Human Rights into five categories: (1) welfare rights; (2) equality rights; (3) liberty rights; (4) political rights; and (5) progress rights; from of these take place ten correlations, mostly retributive, yet some contradictory. Hence, the indic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s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exterminating obstacles to human rights. The analyses are as follows:

I. Welfare Rights versus Equality Rights: from the capitalistic ways of production to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through knowledge economy,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among human beings has, from the commu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mong primitive societies, or the minimal indifference based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 evolved into a great inequality.

II. Welfare Rights versus Liberty Rights: On the one hand, euthanasia, the voluntarily termination of life, is an impact on welfare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duction-wise effective assembly line has interrupted the human wisdom of creativity and freedom of the mind in general.

III. Welfare Rights versus Political Rights: both the political issues that demand professionalism and production goals that demand expertise remain a dilemma, and a difficult line is yet to be drawn concerning the when and how the right of disobedience of the inferior could be justified to take place.

IV. Welfare Rights versus Progress Rights: the massiv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based on modern technology has greatly improved Welfare Rights, yet this exploitation has devastated nature as a whole, and such conflict between the privileg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privilege of welfare rights is in grave dispute, and is likely to affect the welfare of future generations.

V. Equality Rights versus Liberty Rights: in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liberty and equality can become united; yet in economic fields, the full liberation of a free economy is in reality generation great inequality.

VI. Equality Rights versus Political Rights: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minority groups, they are permitted in many cases to join an equalized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forged to being within a framework based on proportional design. Within this design it is impossible to distribute the chanc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ccording to the cap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Such Equal Opportunity not only creates another inequality, but also affects competitiveness as well.

VII. Equality Rights versus Progress Rights: Modern technology is the driving source of Progress Rights, and its surprising advancement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economic field. Production energy greatly increased the distance between Equality Rights and Progress Rights, and how to herald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during distribution without affecting Equality Rights is the main topic heatedly debated by philosophers such as Rawls and Nozick of the 20th century.

VIII. Liberty Rights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at degree would freedom not affect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specially, what is the impact on a body politic when freedoms of speech and press have greatly aggravated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civil government?

IX. Liberty Rights versus Progress Rights: the strength of the restraints that the policies of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set upon the Liberty Rights of an individual is a paradox between the rights of the body politic and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X. Political Rights versus Progress Rights: While a nation develops, it needs the assis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Nations offering aid to nations in need is impossible to exempt demands and terms in return, which would affect the latter nations' Progress Rights.

Human Rights are inborn with a matrix. As History progresses, every general Human Rights would generate other Human Rights, and some would form with others paradoxes. The main purpose of Human Rights Study is to expand their similarities, meanwhile comprehending their paradoxes, and resolving their points

止善 創刊號 2006.12.

of dispute in advance, thereby achieving fluent success as Human Rights progress.

**Keywords: Human rights, Paradox, Politics, Society**